

坚持“两创”
铸就辉煌

绽放中华诗词的时代光彩

周文彰

中华诗词因为语言凝练,讲究押韵、平仄、对仗,读起来朗朗上口,好记、好诵、好传,深受人们喜爱。现代新诗兴起之后,旧体诗词创作并没有衰落,从规模、作者、刊物、活动等方面看,仍然蓬勃旺盛。

近年来,中华诗词学会的工作思路就是让更多人投身中华诗词事业。目前,许多省市区都有诗词学会,甚至一些乡镇也经常举办诗词活动,诗词创作与接受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为此我们制定诗词发展规划,从精品创作、评论与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出版与传播、组织建设等方面,推动诗词事业发展。青年诗词工作委员会、少数民族诗词工作委员会、乡村诗词工作委员会、诗词评论工作委员会等20多个专门委员会相继成立,在宣传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文艺团体等支持下,努力开拓诗词工作新局面。

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华诗词,要聚焦于作品创作。我们拥有庞大的作者队伍和作品数量,接下

来要在质量上下功夫,推动新时代诗词精品创作。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写出反映时代特色、弘扬时代精神的优秀诗词;要有“好诗不厌百回改”“一诗千改始心安”的态度和追求,不断打磨作品,持续提升创作水平;要加大新创作作品推广力度,传播好诗词大赛、诗词报刊、精品选编中涌现出的佳作,让社会各界多关注、多传播、多研究当代诗词精品。

千百年来,诗词培育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涵养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通过更具活力的创作传承、更多途径的传播推广,中华诗词必将绽放时代光彩。我们要始终坚守守正创新,繁荣诗词文化,谱写当代华章,让中华诗词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经典诗词蕴含强大精神力量

莫砺锋

在诗圣杜甫故里河南巩义举行中华经典诗词论坛很有纪念意义。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地位无需赘言,他的意义已经超出文学、超出诗歌,进入文化层面。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杜甫无疑是重要的阅读对象。

杜甫现存1458首,题材内容非常丰富,大到山川云物,小到草木虫鱼,从他心中的喜怒哀乐、身边的悲欢离合,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情况态势,都包纳在诗歌里。简单概括杜甫的主题思想,我认为有两句话:仁者爱人和仁政爱民。仁者爱人,即主张从个人伦理角度,要对他人怀有善意,尽可能地帮助他人、关爱他人。仁政爱民,是从政治角度来说,执政者要关爱百姓,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定、更富足、更幸福。这两者的精神是相通相融的。杜甫把这种精神鲜明、形象、生动地阐释出来。我们读杜甫诗时,首先受到那些优美诗句、生动场面的感染,无形中从杜甫诗中获得了精神的熏陶。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描写的一场成都春天的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读过杜甫,又有多少人从中汲取了精神能量,提升了人生境界。后代就有这样一位读者,认真阅读杜甫,人生得到升华,这位读者就是文天祥。文天祥在监狱里读杜甫,又把这些诗句重新组合成新诗,这样的《集杜甫》足有200首之多。文天祥说,我看到的、想到的、经受到的,杜甫都写过,我把杜甫重新组合起来,就可以表达我要诉说的一切。《集杜甫》告诉我们,支撑文天祥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就有杜甫的光辉诗篇。这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经典诗词蕴含强大的精神力量。

我们研究古典文学的人,非常钦佩杜甫的炼字、对仗、用典、押韵,杜甫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但我们更看重的,是杜甫诗中蕴藏的文化精神,杜甫用诗歌让这种精神浸润每一位读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赓续绵延。

(作者为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繁荣诗词文化

谱写当代华章

既要传承 更要发展

钟振振

对待中华诗词,既要传承,更要发展。传承,是珍爱并保护好中华诗词这棵老树,让“老树春深更著花”;发展,则是培育当代诗词的新树,以期“新花满新树,新月丽新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和文化学习的需求日益突出。当前社会上涌动的“诗词热”和数以百万计从事诗词创作的“诗词人口”,每年千万首的新创诗词数量,正是这一需求的表征。可能有人问:当下的诗词创作,数量虽多,但称得上经典吗?能经典化吗?

我从事古典诗词教学与研究已经40多年,同时也一直从事诗词创作和当代诗词的评论评选活动。我读过的古代诗词和当代诗词,可能比一般人多一些。从个人体验来看,当代诗词确有经典,也一定能经典化。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沉淀,要有足够多的伯乐把千里马挑出来。经典化的工作,不是少数人、短时间便可一蹴而就的,它

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付出努力并持之以恒。当务之急是披沙拣金、煮海为盐,编选各种高质量的当代诗词选本,撰写一批高质量的评介、鉴赏文章,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高质量的当代诗词文学史。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曾设置一个“诗词接句”的环节,委托我从古诗词经典中挑选三句,让观众接写下一句。我挑的第一句就是清人赵翼《论诗》里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原诗全文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遴选最佳接句的过程中,我读到一句“我辈登临正少年”,顿觉眼前一亮。这句诗好在哪里?好在“文化自信”。如果中国年轻人都有此壮志和才华,如果有更多新生力量参与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来,何愁当代诗词不涌现出新的经典?

(作者为中国韵文学会荣誉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采众长 创制新词

谢思炜

宋代诗人黄庭坚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清代诗人袁枚说:“宋人好附会名重之人,称韩文杜诗,无一字没来历。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独绝千古者,转妙在没来历。”二人说法各执一词,其实各有道理。可以说,诗人只有在熟读经典、有长期写作实践后,才能“转”入“自作语”“没来历”这一更高境界。杜甫诗歌就是例证。

“无一字无来处”的说法本身是对杜甫语言丰富性的肯定。宋代以后注家为查实杜甫用语的种种“来处”,付出了极大努力。能够将大量不同来源的词语熔于一炉,也足以证实杜甫在语言运用上的纯熟。唐代重要诗人多学《文选》诗,杜甫与其他诗人相比更有意扩大采用范围;不仅限于《文选》诗,而且扩展至赋及其他文体。杜甫于赋用功甚多,他的很多诗尤其长篇作品,大开大阖,谋篇布局近于赋体;采用赋中的词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除了经史典籍和前代文献,杜甫还将词语采用范围扩展至当代新语,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活

语言——口语,这正是文学语言永不枯竭的源头。杜甫诗中用例既多且大胆,如“喫”字,是口语中的常用词,但在杜甫之后仅见于卢仝诗。又如“剥”字,除杜甫外,再无诗歌用例,在小说、杂剧中才可见到。

除了扩大诗歌词语来源,杜甫更重要的语言创新是使用大量自造新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甫笔下的自己。其所造新词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位居前列,因此才能实现语出惊人的创作追求。由于杜甫的影响力,他所自造的“细膩”“蔚蓝”等词已成为常用词,“珠袖”等词也为此后诗歌所常见。

在杜甫之后,还有一个“词必己出”,在语言创新方面力度更大的诗人——韩愈。可见,对唐代诗人来说,有足够开阔的语言空间留待开拓,所以他们在语言运用上都十分自信。这种博采众长、创制新词,也是诗歌创作活力的生动证明。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

创造扎根时代的新经典

叶延滨

古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从四言、五言、七言,到古风、绝句、律诗,再到长短句、散曲等,古典诗词的体裁形式相当丰富。不过,这一形制发展过程较为缓慢,以至于我们可冠朝代于其首,称它们为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漫长岁月里,古典诗词创作在严格规范下精益求精,已经发展到令后人瞻望的高度,尤其唐诗宋词达到精美绝伦的艺术顶峰。它们讲究格律平仄,起笔引经据典,营造典雅意境,内蕴家国天下、日月山川、生活万象、乡愁亲情。通过古典诗词,中国人养成了发现美的眼光,学会爱与奉献,学会做人做事。

现代新诗是从古典诗词的母体中诞生的,虽只有百多年历史,却与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每个重要历史节点都诞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诗篇。新文化运动时期,新诗不仅掀起文学革命,也带来思想解放;抗日战争时期,新诗激发起

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不屈斗志;新中国成立后,新诗歌唱人民当家作主、意气风发的新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新诗展现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蓬勃活力。可以说,吹响时代号角是现代新诗的重要特点。

新时代以来,古典诗词在社会层面逐渐升温,现代新诗历经百余年发展也呈现勃勃生机,二者共同造就当代诗坛的繁荣景象。

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者要学习现代新诗的创新精神,像新诗那样扎根时代,让诗词创作焕发时代新气象,努力创造与新时代相呼应的经典。现代新诗写作者则要认真继承古典诗词的精神传统——“诗缘情”“诗言志”,用真情感动读者,激励读者向上向前。期待旧体诗词与现代新诗携手并进,共创美好未来。

(作者为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

诗兴当得山河助

李少君

画家潘天寿说:崇高艺术为崇高精神之产物。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诗歌创作。壮丽山河往往能唤起人的崇高精神,让人写出澎湃诗篇。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这样描述黄河。我曾从黄河源头走到青海贵德、甘肃兰州,再到山西永济、河南三门峡,一路上,看到黄河的清澈、曲折、汹涌、咆哮、平静。搜索关于黄河的诗歌,惊觉李白居然写过那么多:“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上来”“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黄河的气势,已转化为李白精神气质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他万丈豪情的来源。

前不久,电影《长安三万里》热映,其中有关于边塞诗的情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些诗歌构建出雄伟瑰丽的美学景观,与之相辉映的是一种浪漫情怀和英雄主义。

我的家乡是湖南。“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陆游这样形容过湖湘大地。沅湘流域、沅芷澧兰,是屈原、陶渊明、刘禹锡、王昌龄、黄庭坚、杨慎、王阳明、沈从文等人的诗意之地,留下过无数灿烂诗篇。我曾长期在海南工作。关于海的诗歌也有不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次到福建宁德霞浦县,那里山海交映,一座笔架山立在海中间,让人感觉只要取下架上的笔,蘸一点霞光,就可写出万千彩章。

山水映道,道法自然。古今中外,自然与诗歌艺术有着紧密关系。对中国诗词来说,自然山水更是不竭的灵感源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几乎是中国诗艺的定律。诗兴当得山河助。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令诗人心潮澎湃。我相信,我们会写出心中理想的诗篇。

(作者为《诗刊》杂志社主编)

不断激发诗歌创新活力

耿占春

古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持久光彩的部分,很多杰出的作品垂范后世,很多诗人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在诗词中得以记录和流传。无法想象,我们的文化生活如果缺少了古典诗词会是什么样子。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提出“六经皆史”。六经中的《诗经》对后世著述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因为相较于知识表述和典章记载,诗是一种描述的语言,它不仅描写现实、记录历史,还表达思想感情。

在塑造着一个民族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同时,古典诗词将汉语之美推上顶峰,并形成稳定的美学风格和修辞范式。但也因此产生一定的封闭性,尤其在面临近代世界历史变局之际,程式化的诗词创作已经逐渐与社会历史脱节,迫切需要进行现代转化。19世纪末,中国现代诗歌先驱黄遵宪首倡诗歌的口语化,这意味着

诗歌写作要更多回到生活与经验的现场。得益于外交官生涯的见识,黄遵宪尝试将一些新器物如步枪、望远镜等写进诗歌。从梁启超呼吁“诗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提出“文学改良”,这些主张都推动着诗歌从面向山林转变为面向社会,从士大夫的文学转变为平民的文学。

20世纪30年代,艾青、何其芳等诗人的创作,不仅为诗歌引入新事物,而且带来了新的表述方式。与古典诗词相似,这套新诗表述方式也会随着写作的积累而固化。直至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诗歌向新的生活与经验敞开,气象才又为之一新。

可以说,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新诗,都在寻求和建构自身的美学风格和修辞范式,也都需要不断突破成规,获得新的创造性力量。诗歌的历史是人类语言和人类精神的历史,它们都处在不断创造、不断生成的过程中。

(作者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让诗词更好滋养人生

林峰

“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古典诗词凭借其独特的抒情、教化 and 审美功能,成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滋养人们精神世界的生动载体。

“诗为心声”“诗缘情而绮靡”等经典论述,凸显了古典诗词的抒情特征。“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词之所以动人心魄,原因在于触动情感。古往今来,诗词佳句摇曳着以情动人的风采。形容恋情,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形容友情,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形容亲情,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岁月变迁,不变的是人的丰富情感。喜怒哀乐,都在诗词中得到最美的表达,引发人们共鸣。

诗词不仅教会我们识文断字,而且教导我们知书达礼、修身齐家,以深刻内涵净化心灵、塑造人格。“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让我们心存感恩、孝敬父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让我们爱国奉献、担当有为;“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让我们珍惜时光、勤奋学习。古典诗

词以这样情感充沛、润物无声的方式赋予我们精神能量。

阅读古典诗词,我们为入世处世能拥有一种审美的境界。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经过诗词之美的长期浸润,会变得温柔敦厚、儒雅从容。面对春华秋实、山河四季乃至日常点滴,诗意总会盎然生发。观山,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开阔胸怀;赏春,会有“春江花暖鸭先知”的欢欣愉悦……人的心灵经过诗词滋养,会变得格外明亮清澈。

诗词的功能当然不止于此。随着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诗词功能将会更大程度得以发挥。让诗词进一步融入时代大潮,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以丰富多样的形式给人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理论研究与评论部主任)

文艺评论

版式设计:蔡华伟